

 CCTV 12
法律讲堂

张程◎著

天下大政

中国政治制度史话

（先秦至隋唐卷）

妙趣横生的历史故事诠释精彩纷呈的政治史话
深入浅出的制度思考领略玄妙深刻的天下大政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天下大政

中国政治制度史话

(先秦至隋唐卷)

张程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下大政：中国政治制度史话·先秦至隋唐卷 / 张程著。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9.7

ISBN 978-7-5162-2045-0

I . ①天… II . ①张… III . ①政治制度史—中国—先秦
时代—隋唐时代—通俗读物 IV . ① D691.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56798 号

图书出品人：刘海涛
出版统筹：乔先彪
责任编辑：董理 柳萍

书名 / 天下大政——中国政治制度史话（先秦至隋唐卷）
作者 / 张程 著

出版·发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话 / 63055259 (总编室) 63057714 (发行部)
传真 / 63055259

http: //www.npcpub.com

E-mail: mzfz@npcpub.com

经销 / 新华书店

开本 / 16 开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印张 / 15 字数 / 174 千字

版本 /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 ISBN 978-7-5162-2045-0

定价 / 36.00 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目 录

泓水之战：规则与贵族的荣誉·····	001
摘缨大会：身份制的尴尬·····	008
百里奚求官：从奴隶到宰相·····	015
颜觸说齐王：士的诞生·····	023
长铗之歌：冯谖客孟尝君·····	030
闹朝击犬：君相缠斗先声·····	038
子产为政：“铸刑鼎”与政治公开·····	046
吕后专权：后妃干政之弊·····	053
七国之乱：宗藩争权之鉴·····	066
缙萦救父：西汉废除肉刑改革·····	080
张释之执法：皇权与司法公正·····	087
桑弘羊理财：政府与市场·····	094
长生不老：汉武帝的实验·····	101
苏武牧羊：节杖与气节·····	109
曹髦之死：中国古代正统之争·····	116
九品中正：门阀制度的滥觞·····	122
汉献帝禅位：羞答答的谋朝篡位·····	130
均田制：理想主义土地制度·····	138





三长制：激辩基层社会治理·····	146
停年格：论资排辈的前因后果·····	154
军镇制度：六镇的兴起与反叛·····	161
三省六部：朝廷的千年主干·····	168
科举取士：中国第五大发明·····	176
张蕴古案：死刑核奏与司法公正·····	185
王维行卷：科举的舞弊与反舞弊·····	192
恩荫入仕：贺知章的难题·····	200
宇文融括户：论使职的诞生·····	208
节度使：跋扈藩镇猛如虎·····	217
进奏院：强盛的古代驻京办事机构·····	225
后记·····	233



泓水之战：规则与贵族的荣誉

泓水是河南省东部地区的一条河流，是涡河的支流。公元前638年的冬天，在泓水的北岸爆发了春秋前期的一场重要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塑造了春秋的政治格局，而且标志着中国政治的重要转折。

如此重要的泓水之战，是宋国国君宋襄公主动挑起的。说起宋襄公这个人，可谓是大名鼎鼎。有人说宋襄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也有人说他志大才疏，根本算不上是当时的霸主，甚至批评他是“蠢猪”一样的政治人物。那么，宋襄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发动泓水之战呢？

宋襄公名叫兹甫，是宋桓公的嫡长子。公元前651年，宋桓公病重。按照当时的嫡长子继承制，宋桓公要立兹甫为太子，准备继位。但是，兹甫向父亲恳求，要把太子之位让贤给庶长兄目夷。目夷年纪比兹甫大，但却是宋桓公和妾室生的儿子。春秋时期，中国封邦建国，政治和社会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在宗法制下，嫡庶有别，嫡长子继承一切。所以，宋桓公没有同意，大哥目夷也不敢继位，逃到外国去躲避弟弟兹甫的让贤。不久，宋桓公去世，兹甫继位，是为宋襄公。兹甫让贤失败，博得了谦谦君子的名声。但是，大家在心里估计都在嘀咕，宋襄公就是一个“傻帽儿”，连国君的宝座都要推让一番。

宋襄公更“傻”的事情还在后面。春秋五霸中最先称霸的齐桓公死后，天下霸主之位空缺，宋襄公就想效仿齐桓公，会合诸



侯，争夺霸主地位。他觉得自己争夺霸主的理由很充分：首先，宋国是一个公国，宋襄公是公爵，是爵位最高的诸侯之一；其次，宋国延续的是商朝的血脉，宋襄公是商王后裔，血统高贵。在周朝的封邦建国体系中，宋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诸侯国。所以，宋襄公觉得自己既有资格，也有道义和责任，在齐桓公之后把天下霸主的旗帜给树立起来。

我们来看看宋襄公是怎么做的。当时，宋国称霸最大的阻力是南方的楚国。楚国势力膨胀，从汉江流域向中原地区渗透。楚国奉行的是赤裸裸的强权逻辑，依靠强大的军队侵略和威胁其他诸侯国。中原地区的不少小国都依附于楚国。宋襄公觉得楚国的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怎么能恃强凌弱呢？为了解决楚国的威胁，为了恢复中原的和平，宋襄公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召开国际会议，和平协商。于是，宋国向各国发出号召，建议各国在孟地召开诸侯大会，讨论恢复和平与国际秩序的问题。

宋襄公的大哥目夷劝谏他说：“我们宋国从实力上来讲，是一个小国。以小国之力召集诸侯，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目夷认为，国际交往是建立在国家实力基础上的，一个小国在国际舞台上办不成大事的。但是宋襄公认为，国际交往是建立在道德与正义的基础上的，只要有理有据，即便是小国也可以纵横天下。目夷见弟弟执意要做，提醒他说楚国人不讲信义，劝宋襄公带上军队去参会，以防有变。宋襄公反感地说：“这是一场和平的大会，况且是我倡导的，怎么能带头不守信用呢？”于是，宋襄公不带军队，充满期待地开会去了。

到了开会的那一天，诸侯们都来了。还没有进入讨论和平秩序的内容，宋襄公和楚成王就因为争当会议的盟主发生了争执。宋襄公说：“宋国爵位最高，理应由我来主持。”楚成王说：“论爵



位，我是王，比你的公爵要高。”宋襄公愤怒了，他说，周朝建立时，仅仅册封楚国为子爵，楚国国君称“楚子”，所谓的“楚成王”是自封的。天下只有周天子才是王，擅自称王本身就是大逆不道！楚成王才不管什么制度、什么礼法。如果遵守礼法，按照制度行事，楚国只是江汉地区的一个小国，怎么可能和宋国争高下？楚国奉行实力原则，相信实力决定地位。正是通过恃强凌弱，楚国才能陆续吞并了周边的数十个小国，扩张到江淮和中原一带。楚成王根本不相信开会能解决纠纷。楚国人把国际会议当作另外一个斗争的舞台，早就暗地调兵埋伏在会场周围。如今，楚成王突然召出伏兵，抓住了宋襄公，带回楚国囚禁起来。所谓的国际会议，立刻不欢而散。宋襄公被楚军关押了一阵子，受到羞辱。其他诸侯觉得这样实在有违礼法，最终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楚国释放了宋襄公。

经过了这次风波，宋襄公应该吸取教训了吧？外交和政治斗争是不管什么制度、道德和礼法的，一切由实力说了算。但是，宋襄公固执己见，坚持道义才是政治的根本。他决定大兴“仁义之师”，讨伐大逆不道的楚国。当时，依附楚国的郑国国君郑文公向楚国行朝礼。诸侯只有在朝见天子的时候才行朝礼。郑文公严重违规乱纪，践踏礼法，宋襄公完全看不下去，决定先教训郑文公。宋襄公要攻打郑国。大哥目夷再次劝阻他，宋襄公不听，亲自领兵进攻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国派兵反攻宋国，双方的军队在泓水相遇。泓水之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战斗打响之前，宋国的司马子鱼想劝宋襄公退兵。子鱼说：“我们宋军的兵甲不如楚军坚利，战士不如楚军强壮，我们依靠什么战胜楚军？”子鱼建议暂且退兵，将来再说。宋襄公却信心满满地说：“楚兵甲有余，仁义不足。我虽兵甲不足，但仁义有



余。仁义道德，在我们这一边。如果以有道之君，避无道之臣，我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宋襄公坚持不退兵。他坚信“道义必胜”，胜利一定是属于宋国的。

两军对垒，泓水作战正式开始。宋军在泓水北岸，占据地利，摆好了阵势。楚军采取攻势，抢渡泓水，向北进攻。当楚军还在渡河，没有全部渡完的时候，司马子鱼对宋襄公说：“楚军人多，我军人少。趁着他们现在没有全部渡过泓水，请您下令进攻。”趁着楚军慌忙渡河的时刻，宋军发动突袭，胜算比较大。宋襄公摇摇头反对。过了一会儿，楚军全部渡过了泓水，开始在河边布阵。子鱼又建议宋襄公下令进攻，趁着楚军还没做好准备发动突然进攻，宋军还有胜算。宋襄公还是回答：“不行。”

宋襄公为什么不同意利用楚军没有做好准备的时机发动突袭呢？因为在宋襄公看来，对正在渡河或者还没有布阵完毕的敌人发动突袭，是不道德的，是不符合礼法制度的。夏商周的作战规范是这样的：双方军队会集在开阔地，约定时间，分别列队布阵，然后击鼓前进，直接发动正面冲锋，决出胜负。所以，先秦的战争，往往是“一个战场”“一次交锋”“一天之内”决出胜负。大家堂而皇之地列队布阵，然后用主力对主力、从正面发动攻击，光明正大、直截了当。宋襄公完全接受不了子鱼“突然袭击”的意见。

等楚军摆好了阵势以后，宋襄公就率军对楚军发动正面攻击。宋襄公勇敢地冲在了最前面。从实力对比上来看，楚国地大物博，楚军人多势众，而宋国国力薄弱，宋军规模较小，正面作战肯定不利于宋军。泓水大战的结果是宋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冲锋陷阵的宋襄公多处受伤，在司马子鱼的拼命掩护下才侥幸逃脱。宋襄公的护卫们都在泓水岸边阵亡了。宋国元气大伤，从此



再也没有力量参与诸侯争霸，只能依附强国、随波逐流。

事后，宋国人都责备宋襄公。宋襄公辩解说：“君子作战，不伤害受伤的敌人，也不俘虏须发斑白的敌人。古时候指挥作战，也不依托地势、据守险要。这些都是我们应该遵守的。即便是亡国，我也不去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

很多人对宋襄公的辩解不以为然。司马子鱼就很不客气地对宋襄公说：“您不懂作战的道理。强大的敌人因地形不利而没有摆好阵势，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对敌人发动突袭？在战场上，只要是我们的敌人，不管是具有很强战斗力的敌人，还是受了伤或者年纪很大的敌人，能进攻就该攻击他们，能抓到就该俘虏他们。敌人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呢？我们奋勇作战，就是为了消灭敌人。敌人受了伤，不忍心再去杀伤他们，就等于放过了他们；怜悯年纪老的敌人，就等于屈服于他们。军队凭着有利的战机，或者利用敌人的困境，完全是可以的。”子鱼的观点是从现实出发的、务实的。战斗就是为了胜利，只要能够达成胜利，过程和手段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观点。估计许多读者也赞同子鱼的观点，也认为宋襄公太迂腐、太刻板了，是一个愚蠢的傻子。不少人也都笑话宋襄公，笑他不懂军事和政治，笑他的傻和蠢。

但是，宋襄公的思想和后来人不一样。他毕竟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那是一个贵族时代。封邦建国和宗法制度造就了世代代垄断高官厚禄的世袭贵族群体。贵族政治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贵族为什么能成为贵族？一个人能够成为贵族，首先必须要有贵族的血统。但是仅有贵族的血统，他只能是一个平庸的贵族，不能成为领导者和社会精英，更不能让广大百姓信服。一个真正的贵族，血统只是“入



场券”，核心竞争力是他的道德品质和精神追求。真正的贵族，必须是品格出众的道德表率，必须是有理想抱负，并且能够带领其他人为了理想、抱负而不断奋斗的人。他可能处于绝对的劣势，甚至可能贫病交加、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但他走在大街上依然是衣冠整洁、抬头挺胸，看到地上有两三个铜板也不会弯腰去捡，看到需要帮助的人还会尽其所能地施以援手。总之，贵族不是生出来的，也不是用钱堆出来的，而是由精神塑造而成的。真正的贵族要做社会的道德表率，维护社会规范，引领发展方向。

宋襄公就想努力成为这样的人。春秋时期已经是一个逐渐“礼崩乐坏”的时代了，诸侯国争斗不断，战争此起彼伏，原先的社会秩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原本“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周天子拥有绝对的权威，建立系统完备的宗法、政治制度来规范诸侯的权利与义务，规范天下人的言行。可惜，周天子的权威早已经衰落，一些大的诸侯国强大起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且这些强大的诸侯国肆意侵吞灭亡其他小国。西周旧制度已经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抛弃。然而，宋襄公仍然坚持日渐衰落的周朝礼法和制度，是因为他想借用西周的那一套规范，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比如，他想召集诸侯大会，讨论和平与秩序问题，恢复周天子颁布的社会规范。为此，宋襄公以身作则，带领宋国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奋斗。他坚信乱世更加需要回归道德和正义，坚信仁义之师必将战胜恃强凌弱的侵略者。宋襄公在泓水的岸边，肯定也看到了宋楚两军实力相差悬殊，肯定也想过宋军惨败的可能性，但是贵族的精神不允许他突袭敌人，相反，激励着他一马当先，从正面向着强大的楚军发动冲锋。

宋襄公的失败之处，不在于他的梦想，更不在于他的坚持，



而是他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大势。历史车轮进入春秋时代，周天子的权威丧失殆尽，权力和资源开始下移。建立在周天子“万世大宗”基础上的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度难以为继，贵族政治的制度基础也就遭到削弱。在这个时候，宋襄公还想用贵族时代的制度和礼法来解决变革时期的现实问题，注定是无法成功的。

宋襄公为现实“抓错了药方”。但是他“治病救人”的行为本身不应该受到嘲笑，相反，值得后世学习。在政治斗争中，贵族精神、道义原则和对仁义必将胜利的信念，永远不应该过时。不理解宋襄公，笑话宋襄公“蠢”的人，不是对贵族精神缺乏了解，就是思想现实、习惯了权谋与明争暗斗。

从实践角度来说，泓水之战标志着中国的战争发生了重要转折，光明正大作战的礼义之兵退出历史舞台，以“诡诈奇谋”为指导的战斗方式兴起。中国人开始植入“兵者，诡道也”的观念，战争再也不复贵族时代的单纯。同样的转变，从战场蔓延到了政坛。开门见山的政策主张、光明正大的政治斗争、持之以恒的理想坚持都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阳奉阴违、反复无常，甚至是尔虞我诈。贵族政治日薄西山，宋襄公式的政治人物几乎绝迹，道德淡出了战场，也淡出了政治。坚持“仁义道德”的人，被人们看作迂腐的人，往往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而深谋远虑、复杂多变的人，却容易成为英雄豪杰。泓水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637年，宋襄公因为伤痛发作，不治而死。



摘缨大会：身份制的尴尬

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有一次平定了叛乱，凯旋后大宴群臣，以示庆祝。楚庄王很高兴，让自己的嫔妃也出席助兴，却没想到因此产生了问题。

席间美味佳肴，自然不在话下；君臣双方都很高兴，轻歌曼舞，觥筹交错，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君臣都没有散席的意思。楚庄王下命，点起蜡烛夜宴。他还特别吩咐自己的宠妃，轮流去给群臣倒酒。轮到楚庄王最宠爱的妃子许姬给大臣们倒酒的时候，忽然吹来一阵大风，把筵席上的蜡烛都熄灭了。宴会上的能见度一下子就低了下来。好在大家兴致都很高，还在那里嘻嘻哈哈的，情绪并没有受影响。

不一会儿，楚庄王看到许姬迅速跑了过来，他感觉有点儿不对。等许姬来到了跟前，楚庄王仔细一看，只见爱妃神色紧张、浑身颤抖，宽大的衣袖也破了，耷拉在那里。这是怎么回事儿？

许姬生气地附在楚庄王的耳边，说刚才那阵风把蜡烛都吹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大臣猛地拉住了她的手，许姬毫无防备，那个大胆的大臣想趁机再把许姬拉到自己怀里，许姬明白过来，拼命挣扎，撕断了衣袖才得以挣脱。也就是说，刚才发生了一起“调戏王妃”的恶性事件。

说完，许姬递过来一个帽缨。原来，那个大臣行非礼之事的时候，许姬急中生智，在挣扎中趁机把他头盔上的缨带给扯了下来，现在拿过来向楚庄王作证。许姬建议楚庄王点亮蜡烛，只要



查看群臣的帽缨，就可以找出刚才非礼王妃的狂徒。楚庄王听完许姬的告状，迅速思考起来。那么，他会怎么办呢？

摆在楚庄王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第一个选择就是下令点起蜡烛，查看群臣的帽缨，揪出那个胆敢在君王面前调戏王妃的狂徒，严厉处置，这也是最合乎情理的选择。第二个选择正好相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可是，这第二个选择也有问题，毕竟有人调戏了许姬，怎样才能让这件事情不被人察觉，当作没发生过呢？

楚庄王沉思了一会儿后，下令先不要点起蜡烛。他大声宣布：“今日设宴，寡人与诸位要尽欢而散。请诸位都摘去帽缨，尽兴饮酒。”听了楚庄王的命令，大臣们纷纷把帽缨摘掉。又过了一会儿，楚庄王才下令点上蜡烛。如此一来，楚庄王明确表达了不愿追究非礼王妃的大臣的罪责，事实上除了犯罪者本人，其他人都不可能知道到底是谁调戏了许姬。最终，这场宴会尽欢而散。

散席回宫后，许姬怪楚庄王不给她做主。大臣调戏王妃，君王都不闻不问。楚庄王解释说：“此次君臣欢宴，目的是增进君臣感情。况且，酒后失态是人之常情。如果一定要追究责任，严加治罪，岂不是破坏宴会的气氛，哪里还有君臣欢宴的味道？”之后，楚庄王也始终没有追究此事。这就是历史上的“摘缨大会”。

楚庄王为什么会有“摘缨大会”的举动呢？要知道，楚庄王是一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君王，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是强硬的“春秋五霸”之一。他想惩治调戏爱妃的大臣，易如反掌。楚庄王之所以不予追究，显然有更深层次的考虑。

后人对“摘缨大会”有不同的解读，其中最流行的解释说，这是楚庄王笼络人心的“帝王之术”。相对于大臣们的忠诚，一个妃子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楚庄王牺牲了许姬，保护了那个犯



事的大臣。后人还给“摘缨大会”补充了不同的版本、但是核心内容类似的故事，作为这种解读的注脚。当时，楚庄王正在与北方的晋国争夺霸主地位，两国的争斗很激烈，爆发了多次战争。几年后，楚国与晋国交兵，楚庄王被晋将追袭，部下将领唐狡拼死前来救驾。也有说法是，楚国进攻依附晋国的郑国，遭到郑国的拼死抵抗。唐狡自告奋勇，冲锋在前，为楚庄王拼死冲杀，最终迫使郑国屈服。战后，楚庄王论功行赏，他表示不要赏赐，并且坦承自己就是当年在宴会上非礼王妃的人。如今在战场上拼死作战，就是为了报答楚庄王当年的宽恕之恩。这种主题的故事很多，也有把唐狡叫作蒋雄的，但君臣之间“投桃报李”的核心内容没有改变。后人编造这样的故事，既解释了楚庄王“摘缨大会”的目的，也印证了楚庄王此举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功效。

如果把“摘缨大会”仅仅看作楚庄王驾驭臣子的手段，那么就事情简单化了。我们把“摘缨大会”放在社会大背景中考察，从春秋礼法的制度角度去衡量，这件事情有着更加丰富、厚重的含义。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贵族和官员阶层居于上层。古代中国的社会等级非常分明，并且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管子·立政》有言：“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槨、绞衾、圻垄之度。”人们从衣服器物上就可以看出高低贵贱来，“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可以这么说，身份社会是古代中国的主要特征之一，古代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展开的。

春秋时期处于贵族政治的时代，世袭贵族占据社会的顶端。



身份、地位等关键词，在春秋时期尤其重要。处于上层的贵族官员阶层，肯定要维护自己乃至本阶层的身份，确保种种利益和特权。其中的一个重要做法，就是保证自己的权威，维持自己的颜面。这应该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一个贵族，一旦受到侮辱、嘲骂，就会威严扫地，还怎么凌驾在平民、奴隶阶层之上？他所属的家族，还有整个贵族阶层，都会感觉受到了冒犯。在“摘缨大会”上，如果楚庄王坚持要追查到底谁是调戏王妃的大臣，就把这桩丑闻公开化了。整个楚国的贵族阶层都会感觉受到了冒犯。最终不是一个人受到处罚，而是整个阶层颜面扫地。而“颜面”两个字，在贵族眼中至关重要。所以，先秦时期就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目的就是保证贵族阶层的尊严和身份。对贵族士大夫的处罚，各国、各个时期都比较慎重。它虽然是权贵们的一项特权，也是维持身份社会的必要手段。

那么，如果贵族真的犯罪了，怎么处罚他呢？“刑不上大夫”里面的“刑”指的是一般的刑罚，如肉刑、罚役、徒刑等。比如，你不能罚士大夫去搬石头做苦役。可是，在一般的刑罚之外，还有很多“附加刑”，如没收财产、剥夺待遇、削弱爵位等。各国可以用附加刑来惩罚他。比如，楚国后期的大夫屈原，为楚国其他贵族排斥，被流放湖南。流放，在当时就是一种附加刑。先秦时期的许多贵族，犯了罪或者政治斗争失败了，往往自我放逐。这样既避免了可能遭受的屈辱惩罚，同时也为当权者解决了“如何惩罚他”的难题。

如果一个贵族犯了重罪，整个贵族阶层都不能宽恕他，非死刑不能解恨，那怎么办呢？遇到这种情况，贵族阶层也会处死犯罪的贵族。但不会像杀死平民一样砍头。贵族的“死刑”只有暗杀、秘密处决和自尽三种。这样做既是为了保证死者的尊严，也



是为了维护整个阶层的利益。

因为，无论何种死刑，都会伤害受刑者的身体，往往不能留以全尸。在行刑的前后，受刑者还要遭受执行官吏、差役的虐待、侮辱，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蒙受围观者的嘲讽、唾骂。对于平日里高高在上的权贵阶层来说，这些屈辱也许比死还要难受。而自尽或者秘密处决，就没有上述这些缺点。对于贵族和官员来说，暗杀、秘密处决和自尽三种方式可以保存个人的尊严和体面。其中，自尽，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古代权贵最“青睐”的死法。

举例为证：秦始皇驾崩之后，胡亥、赵高等人图谋篡位，最大的对手就是太子扶苏和边关大将蒙恬。胡亥等人假传秦始皇诏令，“赐死”扶苏和蒙恬。扶苏肯定也觉得奇怪，但为了保持一个太子的尊严，自尽了。蒙恬觉得奇怪，抗旨不遵，结果遭到逮捕，被关押到大牢里。进大牢后，蒙恬自杀了。他自杀的原因，不是“畏罪”，而是为了免于进一步的刑讯逼供，免于遭到狱卒、刽子手的杀戮，同样是为了保持一个贵族的尊严。

我们再来看隋炀帝杨广的例子。隋末江都兵变的时候，乱兵涌入皇宫，要杀死杨广。杨广坚持说“天子自有死法”，也就是天子死得要有尊严，不能被乱刀砍死。杨广先是要求饮鸩，也就是服毒，后来改以练巾勒死。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反面的例子，发生在秦国的商鞅变法时期。商鞅变法的一大内容，是明刑重典，推行法治。这对秦国发展，是有利的；对商鞅的命运，是有害的。他得罪了秦国的贵族阶层。秦国太子不守法，商鞅严厉惩罚了太子的两位老师，也就是两位贵族。一位被割去了鼻子，一位脸上被刺字。这两种刑罚是当时惩罚平民的主刑，但是对贵族来说是天大的侮辱。两位太